

潘雨廷著作集

道教史發微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潘雨廷著作集

道教史發微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教史发微/潘雨廷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 12

(潘雨廷著作集)

ISBN 978-7-5325-8682-0

I. ①道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道教史—研究 IV.
①B95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3066 号

责任编辑: 刘海滨

封面设计: 黄琛

技术编辑: 伍恺

潘雨廷著作集

道教史发微

潘雨廷 著

张文江 整理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8.25 插页 6 字数 229,000

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500

ISBN 978-7-5325-8682-0

B·1037 定价: 6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“潘雨廷著作集”书目

周易表解

易学史发微

易学史丛论

读易提要

周易虞氏易象释

过半刃言 黼爻 衍变通论

易与佛教 易与老庄

易老与养生

道教史发微

道教史丛论

道藏书目提要

易则 神形篇 《内经》七篇大论述义

易学史入门 论吾国文化中包含的自然科学理论

引 言

潘雨廷先生(1925—1991),上海人,当代著名易学家。生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、中国《周易》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。潘雨廷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,毕业后师从周善培、唐文治、熊十力、马一浮、杨践形、薛学潜等先生研究中西学术,专心致志于学问数十载,融会贯通,自成一家,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。潘雨廷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,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,对中华学术中的《周易》和道教,有深入的体验和心得。潘雨廷先生著述丰富,其研究涉及多方面内容,具有极大的启发性。他的著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。本书由张文江根据潘雨廷夫人金德仪女士保存的遗稿整理而成。

《道教史发微》是作者拟撰《道教史》中的主题论文汇编。本书论述先秦至近代道教史的核心内容,介绍仙与道各种流派的修行方法。

目次

- 绪论 道教史十点纲领 / 1
- 论仙与道 / 20
- 论尚黄老与《淮南子》 / 24
- 《参同契》作者及成书年代考 / 43
- 《参同契》的易学与服气之道 / 58
- 论五斗米道、天师道、正一道之同异 / 69
- 论天师与天师道 / 78
- 论南北天师道与净土禅机 / 81
- 南北朝道教与三洞四辅 / 84
- 孟法师考 / 93
- 论司马承祯《天隐子》 / 97
- 附录：《天隐子》原文 / 103
- 《老子说五厨经》句解 / 107
- 引言 / 107
- 题解 / 108
- 句解 / 109
- 论《真系传》 / 112
- 论陈抟先天易与禅机的关系 / 117
- 谈谈南北宗 / 124
- 论南北宗在道教史上的地位 / 131
- 《悟真篇》和南宗历代的文献 / 140

- 一、《悟真篇》/140
- 二、南宗历代的文献/149
- 南宋初全真道的创教过程/153
- 论北宗之传及上阳子之道/158
- 论李道纯及其著作(附:杜道坚、王玠)/161
 - 附:杜道坚/167
 - 王玠/168
- 《林屋山人沁园春丹词注解》阐释/170
- 论《玄教大公案》/177
- 论《性命圭旨》及其口诀/180
- 论张三丰/186
- 介绍《道藏》中收录的易著/192
- 论《道藏》中所用的十二辰次/202
- 论《五岳真形图》/205
- 论二十四治与二十八治/213
- 论洞天福地及其所在地/221
- 陈式太极拳初探/257
- 太极拳理论探源/261
- 香港圆玄学院教义释/263
- 附录一 道书释要四篇/266
 - 陆修静《灵宝经自序》注释/266
 - 《养生辨疑诀》释要/271
 - 《证道歌》解/274
 - 《紫阳真人悟真篇》五言一首今释/276

目次

附录二 《天师道》序 / 278

后记 张文江 / 282

又记 张文江 / 284

修订本补记 张文江 / 285

绪 论

道教史十点纲领

近数十年来,世界各国学术界有不少学者注意并研究中国的道教。在中国国内,道教亦逐步引起学者的重视。然以整个中国学术界而言,研究道教的学者尚属少数,有关道教的书籍尤少。这一情况可能会逐渐纠正。今考察道教的内容,不应当仅限于宗教。道教与我国科技有明显的联系,对于人体更有独特的认识,且有极丰富的哲理与艺术。它影响中国的民族性,有不可低估的作用。如忽略对道教的研究,殊难编成具有深邃思维且合乎历史事实的中国思想文化史。凡研究任何一门学问,必先了解其史。能有正确的史地时空坐标,方可说明具体人物的思想及其承前启后的作用。然而迄今尚未见内容较充实的道教史,可见今日中国的学术界对道教的研究,犹未踏上最基础的第一级。

为了深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并且变化多端的道教史实,以及历代道教含有特殊价值的具体内容,特编写具有专业知识的《道教史》。先成纲领十点以供参考。

第一点,宜说明写史的方法。我国史籍本有“编年体”、“纪传体”、“纪事本末体”等不同体裁。提高一层视之,同以史地时空为结构,当

以“编年体”为主。“纪传体”注意一人在史地时空结构中的变化,故凡有历史作用的人物,必须为之编成年谱。“纪事本末体”注意一事在史地时空结构中的变化,故凡有历史作用的事件,必须为之编写专业史。而《道教史》属于“纪事本末体”。然道教的本末宜以古今当之,故属通史而忌以断代史观之。既明通史性质的道教史后,方可根据有划时代思想的道教人物以研究道教的断代史。且更有一重要问题,凡写史必宜注意而写道教史尤其突出,就是史的事实可由两种方法加以说明:其一由今推至古,其二由古写至今。此顺逆向量的不同,内容似可同,然往往就此造成了史实的混乱。而道教史的不容易写出,问题就在道教本身兼有顺逆的向量,或等而同之,自然不合乎历史真实。故写道教史时,明辨古今的顺逆向量为最重要的纲领,否则是在写道教而非道教史。且既能明辨顺逆的时空向量,故纪道教事的本末,自然宜兼述历代道教人物的传记及其对道教的认识。且因道教的内容早已包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,故必宜兼用各种时空数量级的“编年体”。这一重要事实于道教中大量存在,惜迄今尚为学者所忽视。今准此纲领,庶可了解道教与我国本有的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。

第二点,宜重视道教的起源。道教的起源,迄今学术界、宗教界尚有不同的观点。写《道教史》时,必须兼收并蓄以见争论的焦点。然合诸古代的史实及今日国内外学者的认识,莫不承认道教为中国自生自长的宗教。故写《道教史》,必须从中国的原始宗教写起。然则中国之有宗教,与世界各民族相似,由来已古。今写《道教史》,宜视之为中国的宗教史,决不可执于道教之名而忽乎道教之实。且“道教”之合名虽后起,而“道”的概念、“教”的概念,在东周时已有极深刻的认识,何况的确具有宗教性质。先秦的学者、秦汉的学者、魏晋以后的学者对道的认识,各有不同的概念。故道教的内容日趋复杂,于起源问题亦有种种传说。至于今日的传统观点,基本认为道教起于东汉顺帝(126—144 在位)时的张陵(亦名张道陵)。历代学者以史实考之,各有不同

的观点。因此宜考察道教始于张陵之说何时产生及其原因何在,并以东汉的史实证其是非。此一基本问题,当详为说明其原委。

宋真宗即位未久,于咸平元年(998)七月癸酉访孔子嫡孙。九月戊寅以孔子四十五世孙延世为曲阜县令,袭封文宣公。且真宗在位时屡屡接近道者,用大量资金敕建道观。于大中祥符八年(1015),诏信州道士张正随赴阙,赐号“虚静先生”。王钦若为奏立授箬院及上清观,蠲其田租。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,而张正随自谓是张陵的后代,世居江西龙虎山。真宗在位二十五年(998—1022),恰当局势平稳、偃武修文之时,而对后世有大影响的文化事件,莫过于封赠孔子及张陵后裔二事,亦可认为真宗本人未必能预料有此大作用。而在客观的历史上,自真宗起,于山东曲阜除孔庙、孔林外,又重孔府;于江西龙虎山的嗣世者,于宋元以来又有世袭的张天师。一儒一道代代相传,迄今未已。此于孔子的家谱,尚有据于古而可信,然研究儒术而有所发展者,不必姓孔。至于张陵的家谱,于张正随之后可信,于其前早有学者提出疑问。且即使可信,孔子与张陵相差约六百年,以我国传统的思想观之,等视为儒道的创始人亦不相称。当元代时已有自认为张良后代的道士张留孙,亦视张陵为张良的后代。其实研究道术而有发展者,亦不一定姓张。然世袭制对中华民族有极大影响,且自宋真宗迄今已近千年,故张天师创立道教之说久已深入人心。今核诸东汉的史实,当时早已有各种道派的道教。张陵——张衡——张鲁祖孙三代所创立者,已有取于巴蜀地区具民族色彩的宗教,故名五斗米道,既非天师道,更无正一道之名。且张鲁之子张盛迁居江西龙虎山,其事尚难确证。即使可信,代代相传至张正随亦可信,然张鲁于东汉末建安二十年(215)降汉,其子张盛传至北宋初的张正随,约已八百年。此八百年间,道教自有其发展的史实,基本与龙虎山张天师的道教无关。且道教的内容,实经此八百年的发展而完成三洞四辅的结构,深入研究其结构,确能有据于古而足以代表中国的宗教。奈何自宋真宗后,既乏

深入研究道教者，乃以张正随的由今推古为见界，失在未能由古至今以核之。如直接考核东汉的史迹，先可提出黄老道，实早于五斗米道。两者同为道教的教派，各有大批信徒及组织，表面视之内容亦相似。进而核诸“黄老”与“五斗米”之实，则黄老有据于古，而五斗米仅属巴蜀地方性的宗教。至于何以不承认黄老道为道教，而必以五斗米道为道教，今究其原因，黄老道的教义为黄巾起义所利用，故自黄巾起义惨遭镇压而失败后，即讳言黄老道。而张陵传至张鲁的五斗米道，能降汉而曹操以客礼待之，且封鲁为镇南将军、阆中侯，在汉魏之际此所以盛行五斗米道。然当时的文献莫不以五斗米道称之，未尝用道教之名。故道教的内容，实汇合各种论“道”的教派，先秦早已存在。如《史记》提及的方仙道等，且《荀子》已引用《道经》之言，故道教自有其历史。然自宋后执于道教开创于张陵，则道教的内容日趋狭隘，与宋前的道教有不同的面貌。故今写《道教史》，当东汉时必须详述五斗米道的情况，在其前的黄老道亦宜深入研究，方可理解产生《太平经》的时代背景。然决不宜误认为自有五斗米道起，我国方才有道教。这一错觉的造成已近千年，对道教信徒更有影响。如未能以史实加以纠正，决难深入对道教教义的认识。然写至宋真宗后，于天师道对全国道教有统治作用的史实，当然亦未可忽视。

第三点，宜认识道教的教主。今日全世界有三大宗教，就是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。凡创立一教，当有创教之人，后世视之为教主。佛教为释迦牟尼，基督教为耶稣，伊斯兰教为穆罕默德。而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亦有三教，就是道教、儒教、释教。道与儒产生于中国本土，释教由印度传入，且在中国有所发展而更传入朝鲜、日本等国，今日已成为世界性的宗教。至于释教在中国发展的情况，颇多取用中国的哲理以加深其大乘教义，最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形成了天台宗及禅宗等。又如《楞严经》及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肇论》等有代表性的佛教名著中，当翻译及著论时，难免渗入中国的哲学思想。然发展至今日已不

可否定其为释教,宜由中国传出与由印度直接传至东南亚者,有大小乘的不同。故释教在中国约两千年的传播过程中,对于教主释迦牟尼的形象,在由小转大、由出世而入世、由无量阿僧祇劫而归诸当下等方面,已不可不重视其原因。中国本有的哲学思想,逐步结合释教本有的哲学思想,经过长时期的酝酿,产生释教在中国的大乘教义。进一步研究中国本有的哲理,基本为道与儒。儒的创始人为孔子,而道的哲理产生于孔子前,故孔子言及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;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;“齐一变至于鲁,鲁一变至于道”,等等。可证在孔子时,包括孔子本人,早有求道的概念。道可逾越生死,又可兼及内圣外王之理,自然可有宗教思想在内。至于专门研究道德的古代著作,莫早于传说为李耳所著的《道德经》。考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至唐代,对道儒释三教的概念有进一步认识,认定道教的创始人为老子,李唐且认其为初祖。此有取于儒教以祖配天的理论,且早为唐代学者所接受。然可注意者,当时三教的概念,与今日宗教的概念,有相似处而尚非全同。宜除释教外,对孔子的儒教是否是宗教,道家与道教是否相同等问题,皆在百家争鸣中。然不可否定唐代已确认李耳、孔丘、释迦牟尼为三教的教主。中唐后经济既衰退,思想亦局促,已无能力支持三教并存。故韩愈起而排佛老,就是以当时的儒教思想排斥当时极风行的佛老思想,且明指释迦牟尼与李耳,未尝提及张天师。故既认《道德经》内容为道教教义所由出,自然可认为《道德经》作者老子为道教的教主。一如既认《论语》为孔子之言,就可认孔子为儒教的教主。凡玄宗的取士,可选考《道德经》且减少考《论语》的名额,更见当时认识道教的情况。而第一部道藏《三洞琼纲》,就编成于唐玄宗之时。

第四点,宜明确宗教的概念。于西方今日有相似而非全同的各种宗教概念。以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道儒释三教并观,更有不同的内容。西方或以有神、无神分辨是否宗教,仍不失为重要分辨处之一。有神者指有人格的神,能主管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祸福以

及生老病死等等。无神者认为天地万物有自然之理,而决无有人格的神。于人类社会中一切情况更由人类本身造成,其间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,莫不有理性在其中。虽理性尚多未能为今日人类智慧所掌握,然本追求理性的原则,必将加深理解,逐步可由相对真理而达绝对真理。此有神与无神,犹宗教与科学的不同世界观。故人对自然的了解,人对本身的了解,人对人类社会的了解等等,莫不有宗教与科学、有神与无神的不同观点。且科学可扩大对事物的认识,这就是进化。当未认识前,可有宗教有神的思想,于既认识后对认识部分即有理性可言,然对未认识部分,仍可有宗教有神的思想。此西方的自然科学家自牛顿起直至近代,所以尚多信宗教者,因不认为宗教与科学有绝对的矛盾。当然亦可认为宗教与科学,确指有神无神而有绝对的矛盾。至于中国传统的观点,从唐代起已等视老子、孔子、释迦牟尼三种哲学思想,各有具体的仪式教规,以礼乐示其感情,以安慰人生的一切际遇及时代的盛衰,并寄托人生的理想。要而言之,有出世入世的不同,儒不言出世,道与释言出世。故以出入世论,儒属入世的思想,故颇多学者主张不宜认为是宗教。然更观道与释的出世,仍有入世的思想。释由小乘而大乘,由声闻、缘觉二乘而佛菩萨。道由深入了解人类本身,由反身起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,然后度世度人等等,确在研究生命起源等问题而更能包括出入世,犹兼及科学与宗教两种相反的观点而有以通之。故中国的三教是否全属宗教,当然可有不同的观点,与今日世界性的三大宗教相比,更可有不同的认识,要在先认定宗教的概念。而道教内部尚有道家与道教的争论,或认为是一,或认为是二,当然亦可各抒己见,究其因仍属对宗教本身有不同的理解。故写《道教史》时,宜明确历代对宗教的概念,主要对道教有不同观点的认识。或不从历史的具体史实叙述道教,难以获得道教发展的可贵知识。

第五点,宜理解道家与道教的关系。以上第四点,已说明准宗教

的概念,可决定儒家是否属于宗教,道家是否可合于道教诸问题。今更直接考察道家与道教的关系,方能深入体验道教的内容。或不论道教的哲理,否定道教必须兼及道家,且仅以庸俗的迷信色彩极浓厚的宗教仪式等为道教,则与重视哲理的中国文化不合,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宗教。且道与有丰富哲理的儒释并立,亦太不相称。然自清代起,尤其是《四库提要》的评论,必以《道藏》中收录先秦诸子等为非,则道教的内容自然贫乏,宜数百年来道教日渐衰微。自唐代第一部编成《道藏》起,道教本有其哲理,早已由道家且兼及先秦各家的学说,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。故以学术论,确可专论道家的哲理,与道教毫无关系。而以道教论,早已见及道家的精微处,方能继承发展,进一步成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道教。故道教加深道家的哲理,一如后世的佛教徒加深释迦牟尼的大乘教义。凡论道家可不及道教,论道教必及道家,此尤为写《道教史》时必须注意的纲领。然此以整个道教言,亦有道教中的部分教义,某一教派的思想,根本可与道家无关,故贵能明辨主次。唯当叙及历代道教具体内容的精微思维时,方可喻道教的一切的确在发挥道家的哲理。

第六点,宜注意黄帝老子与尧舜孔子。考佛教传入中国,较可靠的文献记录在东汉明帝时的楚王英。英为刘秀之子,明帝之弟。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列传》:“英少时好游侠,交通宾客,晚节更喜黄老学,为浮屠斋戒祭祀。”明帝诏书初亦加以支持,谓“楚王诵黄老之微言,尚浮屠之仁祠,洁斋三月,与神为誓”云云。由是“英后遂大交通方士,作金龟玉鹤,刻文字以为符瑞。……十三年(70)……有谋逆事……英徙丹阳泾县……明年(71)英至丹阳自杀”。此知释教初期传入,中国已有相应的黄老学。黄老学的内容,已不可认为与宗教无关,于其前就是西汉初所尚的黄老,于其后就形成为黄巾所利用的黄老道。故自东汉起基本已有道儒释三教,在东汉前方可考察形成道儒二教的史实。当汉武帝(前140—前87在位)完成尊儒术斥百家,对中国思想文化

的影响极大。观其所尊的儒术,已与孔子本人思想有相当的距离,且已综合齐燕方士所形成的方仙道。故由孔子至武帝时的董仲舒,宗教色彩更浓。天人合一的理论,所以发展儒术所重视的以祖配天。而被斥的百家,实以汉初所尚的黄老为代表。或以唐代三教中的道儒论,则已认李耳、孔丘为教主。然以战国中后期及汉初的学者视之,若老与孔本人,尚不足以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源。故于儒,当基于《论语》而及六艺;而于道,又当基于《道德经》而向上推及黄帝的理论。此方为汉初尚黄老的内容。而方仙道的理论,于战国时早由尧舜而上及黄帝。至于儒取古史之标准,辑《书》托始于尧舜,有《论语》可证,其后孟子犹“言必称尧舜”。而道于古史之标准,实本诸黄帝。今已得齐威王(前 356—前 321 在位)时古器“陈侯因咨罍”,罍铭中有曰“绍纁高祖黄帝”。传以陈为有虞氏后,当陈氏在齐,更推知有虞氏高祖为黄帝。其后田氏代齐,齐即大力宣传黄帝,实有以推广儒家《书》始尧舜之说。邹衍作“终始大圣之篇”,“先序今以上至黄帝”,属以今推古之说,然可了解战国时视道与儒之不同,实为黄帝老子与尧舜孔子。故写《道教史》,既当认识老子为教主,更当认识黄老之旨而决非限于《道德经》五千文。故舍黄老道而仅以五斗米道为道教,决不能说明道教中所包含的可贵知识。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收录的书目中,有大批文献重视黄帝,除“六艺略”外,基本可与黄帝有关。此见战国起所认识的古史,早已信黄帝的史实,而不满足于《书》始尧舜。宜于孟子后更无一人“言必称尧舜”,《史记》亦托始于黄帝。今以医论,当重视汉初之公乘阳庆。阳庆实传扁鹊之道,于高后八年(前 180)而授于仓公。考阳庆之医理,与今存中医中的唯一名著《内经》有关。且《内经》之成,似与方仙道有关。此第一篇所以名《上古天真论》,其言曰“昔在黄帝,生而神灵,弱而能言,幼而徇齐,长而敦敏,成而登天”是其义。且其基本原理,全部依据于邹衍的象数,以象数合诸人体的心理与生理,又以人体合诸客观的自然条件,然后推究养生之理与疾病之源。《内

《经》有可贵的整体思想,此书所以能久传而不已。至于托名黄帝与岐伯等的对言,实有以深入《尚书》中虞廷的对言。究《尚书》之《尧典》,亦未尝是当时人之言。凡儒家辑《尚书》之理,所以明社会结构;而道家著《内经》之理,所以明人体结构。人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,以人类的人体为起点,其原可推及人的起源与生命起源。有人与无人的客观世界,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客观世界,当然有所不同。当既有生物既有人以研究人类的社会结构,儒家的思想在研究社会学的人,而黄老的思想在直接进一步研究生物学的人。此《尚书》与《内经》的不同观点,亦成为儒与道的主要分辨处。或研究道教而未及黄老,未足以明道教的精义所在。早期有名的道教信徒必知医理,如葛洪、陶弘景、孙思邈等。而医理的原则,当本托名于黄帝的《内经》。以茅山的三茅君论,实为汉代名医,时间肯定在张陵前。后有陶弘景尊之而有名,然为道教起于张陵之说所限,故三茅君的事迹即囿于宗教迷信中,对中医之贡献始终未为学者所重视。今知陶弘景起,茅山所重视的主要经典,如《黄庭经》、《大洞真经》等,皆与中医理论有密切关系。观葛洪所著《抱朴子·遐览篇》中所著录的道书,全属其师郑隐所收藏。其中卷数多者,仅《养生书》一百五卷、《太平经》五十卷、《甲乙经》一百七十卷三种。此见道教的主要内容,重点在于医理养生,而此文献当属于黄老道,部分于汉魏之际为五斗米道所应用。或放弃黄老道而仅取五斗米道,要在放弃黄帝而仅取老子,实不足以说明汉代重视医理养生的道教。由汉初而上及战国末期,荀子于《解蔽篇》有言:“昔者舜治天下也,不以事诏而万物成。处一之危,其荣满侧,养一之微,荣矣而未知。故《道经》曰:‘人心之危,道心之微。’危微之几,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。”此更见当时的儒有取于《道经》。此所谓《道经》,疑即方仙道的文献。不期荀子所引《道经》之言,为晋梅赜取之,由《论语》舜受尧的“允执其中”发展成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,作为舜对禹的十六字心传,编入梅赜于东晋元帝(317—323 在位)所上的《古文